

評論《水滸》參考材料

(供內部使用)

蘭州大學學理論評《水滸》學習班

一九七五年十月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鲁迅論《水滸》

一部《水滸》，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百二十三页）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宣 讲 稿)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毛主席还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当前，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水浒》这部书进行分析和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懂得什么是投降派，划清革命派和投降派，开展只打不降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是开展反修防修斗争的重要一环。这份宣讲稿。

下面讲五个问题：

一、《水浒》是一部适应地主阶级 政治需要的小说

《水浒》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成书在元末明初。

北宋末年，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政日以堕，民日以困”，封建制度已经走下坡路。当时，皇室贵族、大官僚、大地主霸占了全国六分之一的土地，仅占六分之一土地的农民，却负担着全部的赋税和徭役。宋徽宗是一个荒淫无度、贪得无厌的家伙。他在苏州设“苏杭应奉局”，派爪牙到东南各地强行搜刮民间花石、竹木与珍异物品，给他兴建宫殿林苑。爪牙们以征花石为名，毁家拆屋，大肆掠夺，江南几十个郡都深受其难。

“应奉局”将搜刮所得，用大量船只向京都运送，每十只船组成一纲，称为“花石纲”。仅“花石纲”一项，每年不知消耗多少人力，使千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到了宋徽宗宣和年间，更是“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白骨如山”。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先后爆发了方腊和宋江所领导的农民起义。

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很清楚，有一种说法是：这支起义队伍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以梁山泊（今山东梁山县附近）为据点，人数不多，战斗力不强，曾

宋朝统治中心汴京（今河南开封）威胁极大，当时的地主分子侯蒙曾惊恐地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力必过人”。宋江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于山东、河北、苏北一带，公元1122年，起义军在宋官军的残酷镇压下遭到失败。这是历史上的宋江的情况。我们现在研究的是小说《水浒》中的宋江。小说是文学作品，它不是真人真事的记录，而是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来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小说《水浒》以反对农民革命，宣扬投降主义为主题，把宋江塑造为一个投降派的典型，这不是偶然的。

宋江起义的故事，从南宋起，在民间流传了二百多年，先后经历了人民口头传说、民间艺人说唱和专业作家加工三个阶段。由于地主阶级文人不断插手，他们的反动思想也就不断渗入。宋元以来的地主阶级作家，根据当时统治阶级企图从政治上瓦解农民起义的反革命需要，竭力使宋江故事顺着“受招安、打方腊”这条投降主义路线发展下去。到了元末明初，农民革命的烽火燃遍全国，处在封建社会末期的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革命，一方面进行血腥的镇压；另一方面，采取阴险的招安、诱降手段，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交替地使用着反革命两手政策。为此，他们也注意利用文学这个宣传工具，来为其反革命政治服务。明太祖的孙子、周宪王朱有燉就亲自动手写了两个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杂剧。一个是《豹子和尚自还俗》，通过鲁智深大段唱词，对比当和尚和当“强盗”（统治阶级对起义军的诬蔑）的优劣，恶毒攻击农民起义；另一个杂剧是《黑旋风仗义疏财》，写宋江、李逵等三十六人听到朝廷招安，高兴得手舞足蹈，写他们

“情愿首做良民”，受招安，打方腊，“报深恩”，“做官人”，狂热地宣扬投降主义。朱有燬的杂剧和《水浒》最后成书相差不远，主题思想极其近似。可见，把《水浒》放在它产生的历史背景下去分析，就可清楚看出它是适应地主阶级瓦解农民起义的政治需要产生的。《水浒》成书以后，不少王公贵族、大官僚都收藏、翻印，宫廷里也大演《水浒》戏，都证明了这一点。

《水浒》的版本很多，现在流传下来的重要的有三种。

（一）百回本，称《忠义水浒传》。主要情节为走妖魔、排座位、受招安、征辽和征方腊。

（二）百二十回本，称《忠义水浒全传》。在百回本基础上加入征田虎、征王庆两部分。

（三）七十一回本。明末，统治阶级御用文人金圣叹，砍去《水浒》受招安以后的情节，把原本的第一回改为楔子，又在结尾添写了卢俊义惊恶梦一个情节，让嵇叔夜之类的人物将宋江等人斩尽杀绝，以“天下太平”作结。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工作，完成于崇祯十四年二月，正是李自成攻下洛阳，张献忠打下襄阳，明王朝两个藩王接连被杀、统治阶级陷于土崩瓦解的时候；也是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由招安诱降转入全面武力防御的时候。在这种政治气候下，金圣叹腰斩《水浒》，完全是为当时明王朝对农民的血腥镇压服务的。但砍去了受招安以后的情节，就掩盖了宋江投降以后的一系列叛卖革命的罪恶行为，这样，宋江投降派的面目就不真实了。鲁迅对此非常不满，批判金圣叹“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金圣叹根本不懂得农民起义是斩不尽、杀不绝的，统治阶级的天下也绝不会

“太平”的。同时，他也没有真正懂得施耐庵的原意。施耐庵是要通过塑造宋江这个投降派典型，宣扬投降主义，达到瓦解农民起义的反动目的。

施耐庵让宋江受招安，打方腊；金圣叹却反对受招安，腰斩了《水浒》。这里反映了在农民革命风暴打击下，地主阶级内部两派的斗争：一派主张用软刀子，进行招安诱降；一派主张用硬刀子，干脆斩尽杀绝。从《水浒》产生以后，这种斗争始终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着。“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但不管是软刀子，还是硬刀子，不管是政治欺骗，还是军事进攻，都不能扑灭农民革命的火焰，都不能挽救地主阶级灭亡的命运。这一点，历史已经作了最后的也是最好的结论。

《水浒》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小说，全书以宋江为中心，描写了梁山起义军从发生、发展到投降的全部过程。其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前四十回，主要写梁山起义军在晁盖领导下如何发生发展，和投降派的代表人物宋江如何打入农民起义军内部。

第四十一回至八十二回，写宋江上山以后，如何篡夺领导权、招降纳叛、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直到受招安为止。

第八十三回到一百二十回，写宋江投降以后一系列的出卖革命、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行，分征辽（83—90回）、征田虎（91—100回）、征王庆（101—110回）、征方腊（111—120回）四个部分。

《水浒》从成书到现在，已有好几百年了。《水浒》这部反动小说在民间广为流传，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充斥了旧戏舞台，流毒很广，影响很大。长期以来，在《水浒》的研究中，对小说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对宋江这个古代的投降派，不仅没有给以严肃的批判，反而处处为之开脱辩解，甚至美化和歌颂。不少论文吹捧这部小说为“农民革命

的史诗”，认为宋江是“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光辉形象”，甚至把宋江的投降叛变说成是“农民革命的局限性”。这些观点，都是违反马列主义的，是典型的阶级调和论。必须进行批判。

二、《水浒》颂扬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早在1930年，鲁迅就正确地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鲁迅的论述说明，《水浒》的要害在于受招安，即投降。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接受招安，到镇压农民起义，这是《水浒》描写和歌颂的一条完整的投降主义路线。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思想，贯穿《水浒》全书。小说第二回，全书故事的发端，就写高俅本是一个流氓无赖，仅仅因为会踢球，成了掌管国家军事大权的高官。接着写王教头因高俅当权，官报私仇，全家逃走；林冲因高俅之子欲霸占其妻，被刺配沧州道。《水浒》把高俅作为对立面来描写，目的在于说明皇帝是好的，只因高俅一伙贪官当道，才引起了大宋王朝的祸乱。《水浒》歌颂的主人公宋江，对赵宋皇帝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他说昏庸腐朽的宋徽宗“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他宣称自己不满意的仅仅是“滥官当道，污吏专权”。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宋江受招安——投降的基础和前提，它本身就是一个投降主义的口号。

列宁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毛主席说：“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在封建国家中，皇

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在封建社会中，所有官吏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而皇帝则是他们的总后台，总代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而不是仅仅反对某一个别分子或某一派别。如果不反对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总代表——皇帝，是不能动摇地主阶级的统治的。反不反皇帝，实质上是把斗争矛头是否指向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问题。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农民战争的矛头都是对着地主阶级的国家及其头子皇帝的。陈胜、吴广与秦二世的反动统治针锋相对，在陈县（河南淮阳）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东汉黄巾起义军宣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是说东汉王朝的统治已经完蛋了，农民革命政权应当建立。唐代的黄巢起义打进了长安，赶走了唐朝的皇帝。北宋的方腊起义改年建号，“南面为君”。历史事实说明，坚持农民革命路线的起义军，都是反对封建阶级的国家，矛头直指皇帝的。所以，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国家，反对皇帝，还是只反对某一个别分子，某个集团，不反对封建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反对皇帝，这是农民起义中革命路线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的分水岭。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和农民革命路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不仅如此，宋江提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还有极其险恶的用心。一方面，他向起义军灌输这样的迷魂汤：皇帝是好的，广大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仅仅是因为个别贪官、奸臣当道，他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口号篡改了“和大宋皇帝作对头”的晃盖的农民革命路线，转移了起义军的

斗争矛头；另一方面，他利用贪官为人们痛恨这一群众心理，打起反贪官的旗号，蛊惑人心，争取群众，利用梁山起义军的力量，去实现其争权夺利、官爵升迁的狼子野心，从而把起义军变成了他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派别斗争的工具，改变了起义军的性质。

其实宋江的“反贪官”只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在实际上，他连高俅、童贯这样的贪官也是不反的，而且和高俅、童贯勾结，争取招安，共同镇压革命。所以，宋江是不反贪官，也不反皇帝，而且是忠于皇帝的。

宋江上梁山后，《水浒》紧接着安排了“九天玄女送天书”的荒诞情节，“天书”所宣“法旨”的核心内容就是“替天行道”。这一情节的安排在于告诉读者，“替天行道”是宋江上梁山的目的，也是他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在《水浒》作者看来，封建皇帝是“君权神授”的“真命天子”，封建统治之道是合理的，长存的，宋徽宗是当朝的“圣明天子”，只因受了奸臣的闭塞，故而其道不行，所以才需要宋江那样的天上下凡的“星主”出来“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即替皇帝行封建统治之道，这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政治纲领。

宋江一伙由于不反皇帝，而且忠于皇帝，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他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派别。他反贪官，也是为了忠于皇帝。他和高俅等的矛盾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饿狗与饱狗之间的斗争，是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而且正因为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所以在方腊农民起义的面前，地主阶级内部两派就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农民革命。所以，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受招安——投降，到充当皇帝的鹰

犬，镇压方腊等农民起义。这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必然经历的三部曲。

对于宋江推行的这条完整的投降主义路线，对于宋江叛变投降，成为屠杀起义农民的刽子手，《水浒》自始至终是加以肯定、美化和歌颂的。如说什么：“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对于宋江镇压方腊农民起义，《水浒》作者说由于宋等“削平峭聚贼兵”“活捉草头天子”，“直教宋江等名标青史千年在，功播清时万古传”。甚至以方腊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宋江，说什么：“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当然，《水浒》的歌功颂德，并不能减轻宋江一伙投降派和刽子手的罪恶。相反，倒是不打自招地说明《水浒》是一部宣扬和歌颂投降主义路线的反面教材。

《水浒》对投降主义路线百般歌颂，而对于农民革命路线却横加指责、攻击，对于坚持革命路线的革命农民肆意贬低和丑化。

宋江篡权前，晁盖是梁山泊的领袖。晁盖原属地主阶级，但他背叛了本阶级。“智取生辰纲”的集体斗争，就是由他组织、领导的。案情被官府探知后，他放火烧了自己的庄院，率众拒捕，投奔梁山。他具有坚定的斗争精神，执行了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在政治上，他“托胆称王”，立志“要和大宋皇帝作对”；在组织上，他把李逵、武松等起义英雄接应上山，他任人唯贤，论功排座，明确宣告山寨的胜利“皆托众弟兄的才能”；在军事上，他一上山，立即组织力量，水陆配合，消灭了“进剿”的官军。他和吴用、阮氏兄弟等亲密合作，屯粮、造船、造军器，操练人马，坚持武

装斗争，准备迎接更大的战斗，通过“白龙庙小聚义”、“三打祝家庄”、“三山聚义打青州”等多次战斗，狠狠打击了贪官污吏和土豪地主。总之，由于晁盖执行正确的农民革命路线，使起义军团结兴旺，迅速壮大，为梁山起义事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过去记载《水浒》故事的《宣和遗事》和龚开的《三十六人赞》等书写的三十六人中，都有晁盖，而《水浒》作者却让他在曾头市战斗中中箭，及早“归天”，并把他排斥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是有意地贬低晁盖，以突出宋江这个投降派。

晁盖死后，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派仍然主张推翻宋王朝，夺取政权。在皇帝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李逵蔑视皇权，粪土王法，不仅敢于闹县衙，打钦差，而且把皇帝的御座称为“乌位”，他一再提出“杀去东京，夺了乌位”。这个口号的核心恰恰是要打倒当朝的皇帝，和“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路线是针锋相对的。但是，这种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朴素要求，却屡遭宋江等人喝骂，被斥为“胡言乱语”，“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同时，作者对于坚持农民革命要求的李逵肆意丑化，故意将他写得莽撞、粗鲁、盲动，甚至写他胡乱杀人，以杀人为乐。如73回写乔太公让李逵帮他家捉鬼，李逵寻见“鬼”就是乔太公之女及其奸夫。李把二人都杀了，然后说“吃得饱，正没有消食处”，就拿起双斧将两个尸首乱剁了一阵。作者的这些笔墨为的是反衬宋江“仁德”、“忠义”、“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正确”。

宋江疯狂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投

降与反投降的斗争比较突出的表现在下面几件事情上。

小说的第七十一回，写了一个“菊花之会”，两条路线的代表人物之间展开了第一次正面冲突。宋江召集全体将领宣布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李逵迸发出万丈怒火，睁圆眼睛，大骂起来：“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把酒席踢翻，桌子掀做粉碎。武松沉痛地说：“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鲁智深则用直裰染皂（黑色）不能洗白的比喻说明“招安不济事”，明确地表示，要招安，就散伙。宋江软硬兼施，给以镇压。对强烈反对招安的李逵先要推出斩首，后来在大家求情之下，才同意“监下”。对于武松等则来了一篇劝说，进行软攻，说什么：“今圣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最后，作者让“众皆称谢不已”，肯定和歌颂投降主义路线的“正确”。而且让李逵在宋江鼓吹的忠义面前，完全屈服，让李逵说什么：“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规规矩矩去向宋江请罪，宋江喝斥他“乱了法度，看众弟兄面寄下一刀”，李逵喏喏连声而退。

又如72回，宋江等潜入皇帝的姘头、妓女李师师家，妄图通过她走皇帝的后门，拿到一张招安诏书。正在宋江卑鄙无耻地拜倒在李师师脚下，向李表达“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六六，三十六；八九，七十二，共一百零八，指梁山泊一百零八将。金鸡消息，即大赦招安的消息）的急待招安的“心腹衷曲”时，李逵怒从胸起，头上毛发倒竖，大

闹起来，砍倒杨太尉，烧了李师师的家，“独自一人，要去打这东京城池”，打破了宋江这次投降计划。再如75回，皇帝第一次派陈太尉上山“降旨”招安，当宋江怀着狂喜心情，做着“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的美梦，“只愿安排接诏”时，阮小七却倒换了御酒。念过诏书后，李逵更从梁上跳将下来，“夺过诏书，扯得粉碎”，“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大骂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头！”吓得陈太尉一千人“屁滚尿流，飞奔济州去了”。革命派的这些斗争，充分说明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是不得人心的。但是《水浒》却站在肯定和歌颂投降主义的立场，对于反投降的活动，加以贬低和否定，让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等人物最后都自愿跟着宋江投降并充当“征剿”方腊等农民起义的工具，以显示投降主义路线的正确和胜利。这是作者对于这些人物的歪曲，表现了作者否定农民革命路线的反动立场。

在《水浒》中，对方腊的攻击，更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作者对农民革命路线的仇视。

方腊“自为国王，南面为君”，是一个敢于与最高统治者作对，最后壮烈牺牲的农民革命英雄。但是，《水浒》却攻击方腊是“谋叛造反”，“行不仁之事”，咒骂为“伪朝”、“贼兵”、“反贼”，并屡托百姓之口控诉方腊，说什么方腊“不时科敛，但有不从者，全家杀害”，“百姓累被方腊残害，无处躲避”等等。最后，对于方腊受刑、牺牲，更说是“善恶到头终有报”。露骨地表现了《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攻击。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

盾。”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下，农民就是要革命，要造反，而《水浒》对敢于坚持斗争的方腊起义，是“斩尽杀绝”，对坚持农民革命的英雄人物是敌视和攻击，而歌颂的则是宋江一伙的投降主义路线。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农民不要造反，不要革命，而要象宋江那样屈膝投降。《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反对革命的小说。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并把这种观点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加以分析和澄清。

在封建社会里，是反对地主阶级政权，反对皇帝，还是维护地主阶级政权，效忠皇帝，这是区分农民革命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分水岭。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总是陷于失败。但是，坚持农民革命路线的起义军，都打击了封建统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英勇的斗争精神，极大的鼓舞着革命人民前仆后继，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水浒》中的宋江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和农民起义路线完全背道而驰。宋江只反对贪官，不反皇帝，而且效忠皇帝。他受招安，即投降，他充当封建王朝的鹰犬，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这样一条罪恶滔天的投降主义路线，怎能说成是农

民的局限性，如果这样说，不是把革命和投降，革命和反革命的原则界限都混淆了吗？说宋江的投降主义是农民的局限性实质是为投降主义辩护。

总之，《水浒》这部书主题就是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是一部极好的反面教材。

三、宋江是一个投降派的典型

宋江是贯串《水浒》全书的主要人物，是被作者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竭力歌颂的主人公。《水浒》中的宋江，到底是农民起义“杰出领袖”，还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农民起义“英雄”，还是投降派的典型？让我们作一简要的分析，就可以看到宋江完全是一个投降派的典型。

《水浒》对宋江一生的描写，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从反对革命到怀着“曲线尽忠”的目的钻进革命队伍；（2）上梁山到“受招安”，从篡夺领导权，推行投降路线到公开投降；（3）受招安后打方腊等农民起义，贩卖革命，镇压革命。

宋江出身在一个拥有众多“庄客”的地主家庭。“在郓城县做押司”，是一个小官吏。他“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于家大孝”，被人称为“孝义黑三郎”。是一个满脑子儒家的反动思想，学会了一套封建统治权术的地主阶级的“忠实奴才”。他怀着“忠肝盖地”、“尽忠报国”的心愿，一心想着为封建统治阶级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实现他“辅国安民”，“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凌云志”。为此，他一方面，对上司摇尾乞怜，极力周旋在统治阶级的近侧；另一方面，利用从劳动人